

从“历史回溯”到“范畴重构”： 王亚南对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启示

杨虎涛 唐 瑜

内容提要: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既是时代命题,也是学术难题。本文以王亚南的经济学研究为考察对象,围绕如何系统把握现实、如何从现实中提炼本土范畴,以及如何以方法论自觉支撑上述两个环节等问题,系统梳理王亚南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经济现实的学术研究进路。王亚南以“范畴特殊”为切入点,通过对商品、资本、地租、工资等形态的否定式确认,揭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实现了从套用理论到提炼范畴、发现规律的根本转变。其所倡导的比较、全面、发展三种方法联合运用,与批判实在论的回溯分析在深层方法论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此外,王亚南对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三件套”的强调和综合使用,实际上构建了一种“理论—历史—现实”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超越了当代经济学与历史学研究中“历史细节研究”与“持久性研究”的对立。由此,王亚南的方法论遗产对当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王亚南;范畴特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批判实在论;自主知识体系

DOI:10.19365/j.issn1000-4181.2026.04.01

一、引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2017)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时代命题,让自主知识体系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理论深度,既植根中国实践又能回应全球议题,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关键目标。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现代化进程中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经济发展的历史积累了亟待解释的现象、亟需总结提炼的范畴和规律,需要、应当也必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汲取营养,提炼范畴和理论。

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如何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越时代的方法论典范。他立足于“中国人的资格”,坚持马克思主义,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现象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活水源头,既没有把历史素材碎片化地作为理论的注脚,也没有僵化地用理论公式化、教条化地裁剪中国现实。在长期的

收稿日期:2026-04-10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3&ZD129)。

作者简介: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唐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观察实践过程中,王亚南抓住了中国经济长期踟躅于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转轨的“过渡形态”这个“典型事实”,并以此为基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详细考察中,形成了“土地剥削”、中国官僚资本、“商业资本支配产业资本”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也在理论上实现了从描述表象向提炼本土范畴的跃迁。这种在历史进程、理论应用中发现关键现象、重构特定性范畴的研究路径,实际上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逻辑:真正的理论原创力,源于对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和理解;真正自主的知识体系,也不是裁剪现实去适应“想象的理论”。

本文旨在通过对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等著作中提出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的论述,探讨他所强调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及其在研究对象、范畴重构及逻辑延伸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启示意义,以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借鉴。

二、从“表象”到“深层机制”:王亚南的“比较回溯”分析法

王亚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应用,在于对规律作用前提与关键要素差异的洞察力。从王亚南的整个经济思想体系看,对范畴一般(普遍性)与范畴特殊(特殊性)的界定区分与有机结合,是其理论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之所以适用于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的关键。王亚南强调了经济学所具有的一般性:“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应依据经济学,依据一般经济原则及其诸般研究结论,那差不多是不言而喻的事。”(王亚南,2014)同时,他还重视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性,由此明确了经济史学对于分析过渡期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即从历史必然发展阶段提示中国经济处于何种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这一发展状态或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受哪些法则支配(王亚南,2014)。

(一)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早期探索

对国外经济学说的学习选择、应用变通与融合发展,是近代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重要特点,也贯穿了王亚南学术研究的历程。应当说,近代中国经济学界对外国经济学说,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学派的引进、借鉴和吸收,普遍都比较重视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结合。无论是不同时期中国留学生群体课题研究的主题变迁(邹进文,2010),还是中国经济学会、中国经济学社、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学术社团的创立发展(蔡鸿源和徐友春,2012),都表现出当时的中国经济学者对近代中国最主要经济现实问题的聚焦,都体现出他们致力于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观点论争与道路探索。围绕中国农村土地问题与农民贫困根源的论争、关于工业化路径与资本积累方式的讨论、有关币制改革与货币主权的政策辩难,乃至对中国究竟应走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道路的反复争议,都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集中关注的重大问题。

不过,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涉及用什么理论和如何把握现实两个基本层面。裁剪现实、选择局部现实情况去适用理论,教条地照搬理论,出发点的错误都在于无法准确把握现实。在理论和现实相互印证、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把握现实是主导性的。只有系统、全面地把握了现实,才能从现实中找到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的差异性和一致性,然后在既有理论的范畴一般和现实总结的范畴特殊中找到“适用性交集”,才能有效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既完成理论对现实的指导,又通过现实对理论引申命题的检验达到丰富理论的目的。因此,对现实的把握是理论应用和理论创新的前提,这一点在王亚南那里被反复强调。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的论证,也沿袭了在中山大学讲授高等经济学课程的现实指向性,注重抽象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对照。他在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追问,“中国一般研究经济学的青年学子,在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的限度内,他是否有理解这样抽象的理论之必要,或者至少,他们所研究的抽象理论,是否能拿来同现实,特别是中

国经济现实发生认识上的关系。”(王亚南,2014)认为“研究经济学或者研究什么经济理论,本来是为了拿来作为理解或研究现实经济的手段”(王亚南,2014)。当然,把握现实不只是观察现实,更需要系统全面地透过表象认识现实经济形态的底层逻辑。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将大革命前后至抗日战争结束后围绕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展开的理论讨论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他看来,中国学术界直到第三阶段才真正把握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特征,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未能满足系统、全面的要求。

第一个研究阶段为1924年至1932年(“大革命”前至“九·一八”事变后)。此时学界虽已提出探究中国经济性质的议题,但研究仅局限于城市产业考察,忽视了作为都市产业依存基础的广大农村经济。由此得出中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结论,争议仅在于封建经济仍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已支配全部经济生活,此二者都与中国经济实际相去甚远。王亚南指出,这一局限的根源在于“他们用以诠释中国经济性质的方法,还不允许他们把研究拓展深入到这个视野”(王亚南,2014)。也就是说,这一阶段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缺乏全面性,未能覆盖中国经济的核心构成部分。

第二个研究阶段为1933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这一阶段中国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因实践上的特别重视而转向农村经济,开始逐步接近中国经济的本质,但在方法论层面仍然存在着缺陷:“他们对于方法论的论难,仿佛是在所研究的对象的中国经济、中国农村经济以外来进行,而所论难的有关农业上的诸经济范畴,又仿佛各自孤立着,而没有全部系统的联贯起来。”(王亚南,2014)也就是说,此时的大量研究虽弥补了农村经济这一研究对象的缺口,提升了对现实把握的全面性,却缺乏系统性思维,未能将各类经济范畴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导致对中国经济性质的判断仍不够准确。

第三个研究阶段为1937年“七七事变”至抗战结束后若干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视野的持续扩展,学术界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认识终于趋于完整:不仅兼顾了城乡经济的关联,更实现了经济范畴的系统贯通,方法论也更为成熟。这一阶段之所以能达成对中国经济特征的准确把握,正是因为克服了前两个阶段“不全面”“不系统”的短板,这对真正把握中国经济的复杂特征具有决定性意义。^①

(二) 王亚南的范畴提炼与理论应用

把握现实之后,如何提炼范畴是运用理论的关键一步。如果仅仅只是碎片式地把握现实,就失去理论的整体性;如果所提炼的范畴缺乏与既有理论的关联性,那么理论构建就很难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有认识。当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思潮派虽然已经提出了“中国经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的论断^②,但限于统计资料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足,新思潮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存在概念难以准确界定、论证粗疏偏颇、缺乏历史考察等学理性问题(曾景忠,1988)。王亚南则是以否定式确认^③的独特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现实相对照,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从而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范畴特殊进行了提炼总结。

除此之外,通过对马克思剥削概念的灵活应用,王亚南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剥削形式主要是土

① 王亚南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也有一个曲折过程:在1931年发表的《封建制度论》中他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在福建事变前后,他加深了对都市帝国主义与农村封建残余的认识,重新思考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② 新思潮派以朱镜吾、王学文、潘东周等为代表。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论断由王学文在《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一文中提出,其含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一致。但需要指出,新思潮派和与之论战的动力派都引用马克思的文本词句作为注解,且都缺乏科学深入的分析。

③ 即由它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例如根据李嘉图所研究的经济范畴,从反面来证明中国社会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根据中国的商品价值和地租,又是如何不属于李嘉图所研究的范畴。

地剥削而非资本剥削,进一步判断中国的农民“不是因为缺少资本而被雇,宁是因为缺少土地而被雇”(王亚南,2014)。在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土地的集中驱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而成为工业生产所雇佣的劳动力;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资本发展迟缓,农民只能依靠土地谋生,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使农民从自耕农变为佃农、雇农,从事依附于土地所有者的生产活动。在这一观察的基础上,针对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处于被压制而极为薄弱的状态,王亚南综合整体地考察了资本运动,发现“中国资本的全运动过程,不论是积累,是集中,抑是分散,都捺上了商业或商业性的印记,而不是产业的”(王亚南,2014)。王亚南由此揭示出,中国的资本循环是以买办性、封建性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为主导的,缺乏生产环节,利润流向投机和消费并被超经济掠夺,从而难以实现社会再生产的积累。换言之,近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以旧有生产方式进行的商品生产,是积累不足、有机构成低下、组织形态落后的产业资本。这一系列“范畴特殊”的考察,不仅使近代中国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得以科学阐释,同时也明确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具有生产性、能够实现社会再生产积累的资本循环。

范畴特殊对应于范畴一般,这就更进一步地涉及选择什么理论、运用和发展什么理论的问题。王亚南之所以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源于其阶级自觉,更在于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为剖析“非典型过渡社会”提供了唯一具有整体性视野的科学解剖工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其内在的“广义”视野能够容纳生产关系变革中的历史因素,使研究者能够在不丧失理论一般性的前提下,捕捉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的结构性特征。

众所周知,王亚南所著《中国经济原论》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个成功尝试,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著作在整体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向中国经济、政治、历史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深度拓展。这种选择是建立在王亚南对当时各类竞争性流派的反思和批判之上的。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王亚南的基本认识“是当作完成的舶来品,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是紧随着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或机械品而输入的”(王亚南,2014)。由此,脱离前资本主义的中国现实,对外国经济学说的生搬硬套非但行不通,反而会造成混乱与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理论的形式化模仿,具体在以“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为模本的套用中造成理论的支离混乱(王亚南,2014)。王亚南既批评了唐庆增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足以研究中国经济的文化保守主义论断,也否定了马寅初试图通过重商主义构想改造中国经济的“头痛医头”式方案(邱士杰,2022)。同时,他也认识到奥地利学派在观念上忽略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的异质性(王亚南,2014);而苏联学者将中国强行套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教条主义,则因丧失了对具体时空特定性的把握而必然流于僵化(王亚南,1988)。

(三) 王亚南经济研究的方法论

王亚南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着重强调了其理论方法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指导意义(杨继国,2022)。但王亚南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元理论,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机械套用与教条遵从。虽然,《中国经济原论》在分析框架、基本范畴上与《资本论》相对应,但他并没有被英国的范本所束缚,不是将中国视作西方发展路径的滞后版本,而是将其作为独立的、直接的现实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经济中范畴特殊的纵深剖析,站在“中国人的资格”这一立场上,实现了从被动套用理论到主动提炼范畴、总结规律的转变。这或许正是王亚南留给后人最值得深思的地方:一个学者与一种理论之间最富成效的关系,不是注疏与阐发,而是通过问题意识去逼问它、延伸它,甚至于在它照射不到的地方另辟蹊径。

这种从范畴特殊的提炼以及范畴特殊和范畴一般的对照分析过程,是通过怎样的方法形成的呢?对此,王亚南(2025)曾提出三种方法:“只有依据唯物辩证法才能把我们那种处在转变过程中的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弄个明白。因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一个最可靠的科学真理,

就是不管所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如何复杂,如何具有引人入胜或发生错觉的表象,只要透过表象去看它的内部的联系,抓住它的本质,就有可能掌握它的来龙去脉或发展规律。”如此,王亚南以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将唯物辩证法贯彻于经济形态的研究之中,深刻揭露了近代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性质及其特殊规律。比较的研究法是“普通一般在任何场合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但这里在运用上却赋予比普通一般更深的意义”。更具体地说,“研究现实经济一般是要从思想材料出发,是要利用已有的经济原理或基本观念的,如其我们对于某种经济现实,尚没有确立起基本规律,或没有大家公认的基本原则则可资依据,那只好自行另起炉灶,用借喻或比照的方法,来确立其本身的规律”。全面的研究方法强调“不是叫我们去平面地考察事物,而是要我们深入那整个交互关系里面,去发现其各别发生差别影响的具体事象来”。采用发展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必然要求,对于全社会的经济事象,“我们必须在它们这种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去看它的特质和动态”。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需要把握近代经济的发展演变,也可能涉及过去传统封建经济因素。王亚南还特别指出,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方法在研究中需要加以综合运用,例如“要彻底明确理解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及其作用,不但需要把它同资本社会的商业比照来看,还需要从它对全社会经济的关系,对以往历史传统的联系来看”。

上述三种方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抽象力”的实现机制,并与以“比较回溯”为特征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具有深层的内在一致性(布朗等,2007)。唯物辩证法与批判实在论都是从“表象”剥离到“深层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分析,就包含着一种回溯逻辑:从现象出发,逐层穿透表象,揭示深层的生产关系与历史机制。在批判实在论者看来,唯物辩证法强调透过表象去看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批判实在论在将世界分为“经验”(empirical)、“实际”(actual)和“实在”(real)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不是描述感知的事件,而是揭示产生事件的“深层结构与机制”;辩证法所倡导的普遍联系,就是批判实在论刻画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构性涌现”。在具体方法上,批判实在论主张通过比较回溯的方法对无法进行可控试验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将历史展开的过程视为一个长时段的、多因素的开放实验,然后从中寻找反复被触发的机制和蕴含不变特征的一般范畴和变化特征的特定范畴。

王亚南通过中国与西方、封建与半封建的横向与纵向比较,实际上就是在利用历史造成的“自然干扰”来考察经济系统的反应。正如演化分析通过对比不同时间段的“社会化石”来寻找变异规律一样,王亚南的比较研究法旨在通过对差异的辨析,寻找支撑中国特殊国情的那套“关键特征”。王亚南的“发展的方法”要求从近代中国经济的演变中远溯传统因素,这在本质上就是演化经济学的“回溯分析”。这种方法论强调“终极原因”(ultimate cause)的解释,即一个现象之所以存在,必然包含其“如何而来”的历史过程。这与马克思从商品和货币的起源中寻求范畴一般的逻辑是一致的:通过在历史的动态流转中观察哪些因素发生了改变(变),哪些结构具有连续性(不变),从而提炼出具有历史厚度的科学范畴。这种比较回溯的过程不仅是历史的叙述,更是一种“不明探测法”,它允许研究者在未发现内在机理前,先以假说形式回溯因果链条,并在长时段的历史检验中通过“趋势”而非“绝对定律”来验证理论的真理性。简言之,王亚南所提炼的那些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经济范畴,正是在历史比较与回溯探源的过程中逐步浮现的。他所倡导的分析方法,正是在难以进行可控试验的社会科学领域,以逻辑与历史的相互印证替代实验室意义上的因果验证。

这种“开放试验比较法”的关键,在于将“比较”作为区分“变”与“不变”特征的手段,并以“回溯”提供理论假说,从而规避了无概念的材料堆砌。王亚南提出的“比较研究法”并不是简单的现象并列,而是利用多样性和差异性提供的天然观察条件,探求特定形态下的特殊规律。因为单纯的比较如果缺乏理论回溯,极易沦为早期历史学派“集邮式”的归纳。王亚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强调“范畴特殊”的提炼与“范畴一般”的对照,这正是一种“回溯分析”(不明探测法)的体现。从

经验事实回溯到深层结构,他将中国社会的商品、货币、资本形态重新命名与归类,使原本零散的历史素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下具有了科学意义和现实价值,从而揭露出中国经济运行的结构、事件与经验之间的因果机制。

这种方法论组合指向的,是一种超越“绝对定律”的、具有主体性的知识构建。王亚南对比较、全面与发展三种方法必须“联合采用”的强调,实际上构成了对异质性世界变化过程的系统化观察:全面研究要求深入交互关系发现差异,发展研究要求捕捉历史连续性,而比较研究则要在时空参照中确立特征。这种方法论逻辑与现代经济演化分析中“趋势而非定律”的批判实在论思想不谋而合。它承认因果关系总是与特定历史背景相关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任务不在于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而在于通过这种开放性的试验比较,在历史回溯中发现那些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趋势性力量”。这种方法论自觉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它提供了什么现成的答案,不如说在于它确立了一种提问的方式。这对于今天仍在探索中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而言,或许比任何具体结论都更值得认真对待。

三、理论、历史与现实的三位一体: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的方法论整合

王亚南对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三个学科的强调,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其理论结构必须内嵌于经济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的客观进程。恩格斯在评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写道:“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恩格斯,2012)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虽然表现为抽象的逻辑演绎,但范畴的确立顺序、内在关联与历史展开需要与经济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对应。

在王亚南那里,政治经济学提供范畴一般的逻辑框架,经济史学提供跨时空的历史参照与制度演变规律,中国经济史则提供本土经验的情境与素材。王亚南(2025)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形态的准备工作,至少应当相当透彻地了解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和中国经济史这三门科学,具体指出“我们研究中国这种经济形态应依据政治经济学,依据一般经济原则及其诸般研究结论,那是不言而喻的事”。作为具体经济现象的一般概括,政治经济学反映经济现实,也指导经济现实。经济史学侧重“史实及个别历史社会相续转变的经济规律”(王亚南,2025),能够为经济形态的研究提供参照镜鉴。对于在中国社会史性质论争中逐渐萌芽发展的中国经济史,王亚南(2025)也给予了充分重视,“我们研究中国这种经济形态绝不能忽视这尚在萌芽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史所可能给予我们的直接间接的帮助”。王亚南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和中国经济史这“三件套”,与熊彼特所重视的历史、统计和理论有着相通之处。区别只是,王亚南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经济形态,而熊彼特的任务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分析。

(一) 经济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重视历史,在经济学传统中由来已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往往扎根于深厚的历史观察。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就大量运用历史证据,以至于研究者称他“除了作为现代经济思想的奠基人,还可被视为最早的现代经济史学家之一”(Manioudis & Milonakis, 2021)。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关系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进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断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即使在新古

典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在经济学还处在多元主义的时代,经济学家对历史问题也十分关注。凡勃伦就认为,对于所有经济系统而言,理性和制度都不能被视为唾手可得的免费午餐,它们是人类历史的有代价的产物,忘记历史的经济学既不能解释理性和制度的产生,也不能解释它们的性质和它们的边界所在(霍奇逊,2012)。约瑟夫·熊彼特(2017)也曾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指出:“‘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根据 McCloskey(1976)的统计,在王亚南所处的时代,经济学家对历史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历史高峰,美国顶级三大经济学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的经济史论文占比在 1925—1944 年期间达到了峰值(JPE 9.9%);经济学家漠视乃至忘记历史,则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达到高峰时期的 20 世纪 70 年代,1975—1984 年 AER、QJE、JPE 的经济史论文占比,已经从 1925—1944 年的高峰锐减至低谷(QJE 仅 1.7%)。

同样在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也经历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20 世纪 30 年代)。这一时期,经济学理论作为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得到利用,经济学的概念框架与分析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得以融入(王鹏翀和梁捷,2026)。在经济理论为史学研究拓展研究议题与理论深度的同时,利用经济学概念工具、关注经济事实的史学研究也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文本档案整理与基础的社会调查统计。在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下,涌现出以汤象龙、严中平、陈翰笙、方显廷、王亚南等为代表兼具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双重身份的学者,制度分析与数据实证见诸研究。也正由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概念方法的融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往往在历史学家的史料整理和分析中得到自然延伸。可见,中国经济学的初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史学对外国经济理论与方法利用的结果,但经济学界对逻辑演绎的日益偏重注定了这一理论发展路径的衰微。

随着量化历史研究的兴起,长期历史分析重新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经济史论文发表数量、经济史专业博士就业重回 20 世纪前半叶的历史高峰。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计量方法的进步可以基于历史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以实现因果推断;二是文本、数据资料的极大丰富。因此,这一复兴本质上是对历史材料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的结果。但从学科互补和未来发展看,历史学与经济学不只是原材料与技术加工的关系,而应该在有机融合中实现学科的长期繁荣。就因果推断而言,历史学的优势补充在于:经济学中真正的双盲随机试验极为罕见,很多研究看似自然实验,但存在初始条件非随机性的问题,而历史研究可以提供“足够的间接证据”强化因果关系的论证(Morck & Yeung, 2011)。具体而言,第一,历史学通过详细的历史背景、事件脉络和个体决策记录,为因果关系提供“信息强度”支撑,弥补经济学模型简化导致的缺失;第二,历史学通过构建相互竞争的叙事,同时结合“奥卡姆剃刀”原则,选择更简洁、更能连接重要历史节点的解释,持续检验因果关系的合理性;第三,与经济学仅仅注重学科内部理论逻辑的一致性不同,历史学研究需整合地理、政治、气候等多领域事实,天然强调跨学科研究的外部一致性,可从多维度丰富现实认知并为经济学提供更全面的因果解释框架。

(二) 经济史研究的二元对立及其超越

尽管如此,按照 Bisin & Federico(2021)在《历史经济学手册》导论中的划分,经济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仍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经济史学家,他们以“理解历史本身”为目标,将探究历史社会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与数学、哲学等学科相似的纯智力活动,认为理解过去本身就足够重要,历史研究未必需要为当下带来直接的实用价值或政策启示;另一类是研究历史如何影响现在的经济学家,他们并不认可历史本身的价值,仅关注历史对当下经济的解释力,试图以过去来寻找当下经济问题的答案,也即所谓“持久性研究”(persistence studies)。前者是以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史学家,他们更侧重历史细节,而不是以单一的理论演绎或整合历史聚焦于历史情景中机制的理解;后者是以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为代表的新计量史学家,更侧重与现实问题的关联,以历史数据检验由经济学理论所引申出的命题,聚焦于历史冲击如殖民制度、强制劳动等对当代经济结果的长期影响。

在王亚南所处的时代,计量史学还没有兴起,经济史学的研究还停留在传统的数据挖掘和历史数据统计而非因果关系检验上,中国经济史还聚焦于关键历史节点的大变,如夏商之变、周秦之变等问题的研究。然而,从王亚南对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和中国经济史“三件套”的重视来看,他强调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的结合,是一种质性与定量的结合,侧重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质性把握与对经济形态演变逻辑的整体理解。其中,经济理论提供基准分析框架,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则提供“历史语境”的选择,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结构、制度环境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去检验命题和发展理论。这既不同于Bisin & Federico(2021)分类下的以“理解历史本身”为目标的传统经济史学家,也不同于用现代计量方法去进行“持久性研究”的现代计量经济史学家。对王亚南而言,理解历史本身是重要的,但历史细节服务于分析范畴的提炼;研究历史如何影响现在也是必要的,但需要坚持历史现象的整体性与复杂性,认为只有把握历史语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才能真正理解经济形态的本质。由此,统计数据、历史细节的丰富更应指向复杂历史语境的概念提炼、历史事件发生机制的理论构建,对机制与规律的认识不停留于历史本身,与现实的关联也应避免简化。

可以说,王亚南的研究展现出一种超越“持久性研究”与“历史细节研究”二元对立的辩证视角。王亚南在20世纪中叶的论述中,虽然尚未明确使用“持久性”这一概念,但已蕴含着将历史影响的“长期性”与中国历史的“情境性”相结合的思想。他的经济史研究既不满足于纯粹的历史细节考察,也没有当前经济史持久性研究的学者为追求完美因果关系检验而剥离历史语境的简化倾向。历史细节对于王亚南的研究并非不重要,这从他对制度文本、政策文件、社会调查等非结构化资料的重视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研究始终以理论构建为核心,历史细节分析都服务于“质”的判断,服务于现实解释与实践指导的根本目标。如其所言,“本来,我们晚近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最初很可以说是为了满足确定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要求”(王亚南,2025),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为我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王亚南,2017)。在《中国经济原论》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王亚南始终扎根历史细节,通过梳理历代土地契约、赋税档案、地方县志等一手史料,明确中国封建社会以地主经济形态为主导,迥异于欧洲领主经济的土地依附关系。他还将地主经济与半封建生产方式深度结合,从土地兼并与佃农剥削模式的经济结构、地主阶级与官僚体系的共生的政治权力体系、重农抑商观念的文化传统等多个维度展开整体分析,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解答了中国近代未能自发走向资本主义的谜题。

王亚南并不否认历史对当下的持久性影响,但现代计量史学长期以来着重于以简约式估计(reduced-form estimation)识别核心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适配基于数据挖掘与研究设计的因果推断方法,往往也就需要将复杂、长期的历史现象简化为可操作的“不变”,而忽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动态调整与情境差异。王亚南所倡导的经济史研究,坚持历史现象的整体性与复杂性,认为只有全面把握历史语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才能真正理解经济形态的本质。在具体分析上,他尤其强调在“变与不变”的动态对照中考察历史影响的传导逻辑:秦代确立的地主经济制度是“不变”的根基,而历代赋税政策调整、科举制推行、儒术独尊等则是“变”的表象,通过剖析这些变量的互动,揭示出官僚政治为何能跨越千年延续;在对中國官僚资本的研究中,既看到官、商、地主、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经济形态这一长期稳定特征,也关注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经济形态对工商资本的侵蚀与消融。在王亚南看来,历史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结构延续与局部变革的矛盾中不断变化。这既保留了历史的复杂性与整体性,又通过理论提炼实现了对现实的深刻观照,

形成了连接历史考察与现实解释的独特学术范式。简言之,历史包括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在王亚南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在于,它为理论分析提供历史特定性的观察,这与现代计量史学对历史的“工具化使用”有着本质区别。这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密不可分;历史服务于范畴提炼和逻辑体系的建构;历史的持久性影响须在整体历史情境中把握。历史与逻辑在王亚南那里不是两种并列的、孤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王亚南对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和中国经济史“三件套”的强调,本质上是构建了一种“理论—历史—现实”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根据 Cantoni & Yuchtman (2021) 的研究,现代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处理面临着“路灯效应”(streetlight effect) 的困境——研究者倾向于关注方便获取高质量数据、容易被量化的历史现象,从而忽视更宏大、更复杂的历史进程。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脱节;计量实证研究过度追求方法严谨性,往往脱离了历史具体情境;反之,部分传统历史研究则缺乏理论支撑,难以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规律。王亚南所倡导的研究范式,提供了打破这一两难困境的思路:政治经济学为研究提供了抽象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确保研究的逻辑性与系统性;经济史学提供了跨时空的历史参照与规律借鉴,避免研究陷入本土经验的狭隘性;中国经济史则提供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现实基础,确保理论分析不脱离实际。这种“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历史学的情境化优势与经济学的理论化优势,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史料、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

四、王亚南经济研究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启示

从王亚南提出发展中国经济学,到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国家战略,时代不同问题不同,具体任务各异,但经济学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必须立足中国现实提炼本土范畴,在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的对照中实现从经验描述向理论表达的跃升,并以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形成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确立的重要标志(孙正聿,2024)。以此衡量,王亚南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传统中国地主经济与官僚政治的研究,以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为支撑,以比较、全面、发展方法的联合采用为路径(王亚南,2025),深刻体现了从被动套用理论到主动提炼规律的构建,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的早期成果。

以王亚南的方法论标准审视,当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政策话语与学术范畴混同。部分研究倾向于将政策文件的表述直接作为理论范畴使用,所谓本土概念往往停留于描述性标签,难以进入更广泛学术共同体的对话框架。第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不足。现有相关成果往往偏重对当前政策实践的阐释和规范性论证,对历史维度的运用多停留于史料引证或背景陈述,没有真正实现理论逻辑与历史进程的双向校验。第三,学科分割制约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建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乃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往往相互隔离。重温王亚南构建中国人的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论,贯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对当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以方法的创新应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需要比较、全面与发展方法的创新应用。这是因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就需要正确把握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的关系。从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来看,这些概念既要能用于描述和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特殊的现象,又要与既有理论存在一般学理上的源流互通,即使不同,也有学术可比性。这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如何从中国社会经济历史与现实提炼中得到范畴特殊,如何在整体理论体系的延伸拓展中回到理论一般。

对于前者,首先,需要以准确把握现有范畴一般的科学内涵为基础,将同一范畴下的中国经济现象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横向比较,考察同一范畴在中国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形态演变,由此识别出

范畴的核心差异及其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性质、关系、运动规律与趋势结果等,从而使“特殊”得到初步界定;其次,将所研究的范畴特殊放入整体联系的系统中进行考察,分析其在一定结构下与其他范畴的相互依存与制约,由多重、本质关联融入逻辑自洽的范畴体系;最后,在历史发展中把握所提炼的范畴特殊,探究其生成与发展的演变规律,厘清特定时空条件下具体内容的“变”与“不变”,使之避免教条标签而具有内在的理论生命力。王亚南在对近代中国商业资本、雇佣劳动等范畴进行“同名异质”分析时就遵循了如此路径。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凡是产生了较高公认度的原创性范畴往往也循此逻辑而来;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计划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范畴突破,还是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为核心重建比较优势理论,抑或是新型举国体制对国家主导创新与市场竞争机制有机结合这一中国特色的凝练,以及新质生产力对技术革命条件下生产力质变内涵的概括,其共同之处都在于从中国经济现实的特殊性出发,在与既有范畴一般的对照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新概念。

对于后者,核心在于从范畴特殊出发完成向范畴一般的回归,使本土经验具备跨情境的理论可通约性。这一过程同样需要比较、全面与发展方法的运用,只是方向相反:在比较中剥离现有范畴一般中隐含的历史特殊性,将中国范畴特殊所蕴含的更具普遍性的内容抽象出来,实现对既有范畴的“提纯”与扩展;在全面联系中,从范畴特殊的整体结构中识别同历史条件下反复显现的结构性规律,推动范畴一般在内容上的实质拓展;在历史发展中,以中国范畴特殊的演变轨迹检验和丰富人类社会范畴一般的可能形态。王亚南以近代中国资本形态的演化拓展了资本运动的一般理论,以经济恐慌的中国形态丰富了经济危机理论的解释边界,就是这一方向的典型示范。当代中国经济学中,新发展格局对内外循环关系的诠释,就深化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市场理论的一般内涵,共同富裕对分配正义与增长动力关系的重新表述,也在福利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既有框架之外开辟了新的理论生长点,两者都不是止于描述中国特殊,而是对范畴一般的充实。

从范畴特殊与范畴一般的关系来看,中国范畴特殊的提炼、应用与发展有一个从范畴一般中来、到范畴一般中去的过程。更直接地说,需要有理论来源与依托,不能自外于人类社会长期积累演进的基础科学体系、脱离范畴一般而违背知识生产规律、丧失理论发展与应用的生命力。与同一时期标新立异的经济研究,如章士钊等讨论的以农立国论、李权时等提出的消费决定论等相比^①,王亚南的研究之所以更具解释力和应用价值,就是在范畴特殊上指向了中国现实,在范畴一般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就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并得到理论的延伸发展。这也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所需要的。从什么样的思想材料出发,如何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直接决定了所提炼的范畴究竟是具有解释力的原创概念,还是贴着本土标签的外来移植。王亚南的研究路径表明,只有在范畴特殊的提炼与范畴一般的延展之间找到结合点,所形成的理论才既能解释中国现实,又能被更广泛的学术共同体所理解和接受,从而真正具备传播中国经验、推广中国理论的能力。

(二) 以学科的有机融合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除方法的创新应用外,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学科的有机融合。如前所述,王亚南的成功探索尤其是他对范畴特殊与范畴一般的认识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社会科学从根本上是历史的,但如何认识历史、借鉴历史学科的研究,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则见仁见智、路径各异。历史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共同的研究对象,这为学科交叉提供了可能,但历史学重在探究“发生了什么”,经济学则聚焦于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二者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和路径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分歧的自强化循环下,长期以来,经济学对历史的认识和使用基本止步于宏大叙事与背景轮廓,不关注具体过程细节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对历史学研究方

^① 章士钊于1923年11月《新闻报》发表《农国辨》强调以农立国论;李权时以消费范畴为起点论述其经济体系,将消费决定论贯彻于1933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之中。

法则更是疏远甚至轻视。无论是早期历史统计的探索,还是近来计量史学的兴起,实际上都是沿着工具化利用历史资料的路径深化,而未能在更宽广的科学视阈下触及经济学与历史学在学科知识积累与视角方法上的融合。

在建构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一宏大主题上,学科之间的鸿沟既会导致对现实把握有所局限,也不利于推动理论创新。并且,正如王亚南以经济史学和中国经济史为依据对中国特殊事象进行剖析,把握中国实践经验、提炼中国理论范畴一样,历史作为经济学范畴特殊与范畴一般的中介、载体与现实关照对象,也需要得到更多维度的理解。这就意味着历史在经济研究中不能仅仅体现为以检验某些经济学命题为目的而被使用的数据。从王亚南的经济研究来看,经济史学提供了历史阶段必然、一般历史法则的启示与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确证,中国经济史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线索、提炼范畴特殊的经验基础。同样,重视经济史学的参照系与科学规范性作用,把中国经济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所必需。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生命力既存在于科学发展范畴特殊与范畴一般的辩证统一中,也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王亚南关于传统中国地主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与经济形态、中国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的理论创新,围绕当时过渡时期中国发展的道路前途与革命任务展开。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直面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技术浪潮及其相伴的创造性破坏、社会与政治领域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中的重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经济的矛盾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后发国家、南方国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产业战略选择与社会治理上的多样性,常被视为一种对标准框架的“偏离”。历史终结论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确立为发展终点,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则将大国博弈的冲突性、零和特征描述为必然。这些论断所呈现的,不过是西方国家自身兴衰历史的理论投影,而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已提供了足够的反例,使这些论断的普遍性预设难以成立。这与王亚南所处的时代如出一辙,彼时西方经济学同样无法解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经济现实,正是这种解释力的缺失,才逼出了王亚南式的范畴特殊提炼与理论本土重构。今天面临的任务在性质上并无根本不同,时代问题的复杂程度或许更甚,但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所需要的方法论自觉,与王亚南当年仍然一脉相承。

沿用比较、全面与发展的分析方法,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有机融合中,既剥离西方理论中被误作普遍规律的历史特殊,又从中国经济现实中提炼具有更广解释力的范畴特殊,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能够也必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主题形成系统的问题意识与范畴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是根本推动力(刘守英和熊雪锋,2022),西方经济学的既有积累也可以在与中国现实的对照中得到批判性吸收与重塑(孙圣民,2023)。正如王亚南的研究贯通了历史、经济与政治的多重维度,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需要对技术变革、社会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等相互交织的重大问题形成整体性解释。从经济思想史的规律看,具有生命力的学术范畴一旦确立,便会在命题的引申与检验中逐步积累为结构化的知识体系。王亚南以一部《中国经济原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早期路径,其方法论的意义并不止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如何立足现实提炼范畴、如何在范畴特殊与范畴一般之间保持理论的“来路”与“去路”,仍是今天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持续回答的根本问题。

五、结语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时代命题,又是学术难题。面对社会经济复杂变化与理论思潮多样奔涌的近代中国,王亚南避免了裁剪现实适用理论与照搬理论教条的两种错误倾向,在对

中国特殊现实与一般理论范畴的把握中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围绕当时过渡时期中国发展的道路前途与革命任务展开了对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化的探索。

从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来看,立足中国现实提炼本土范畴,在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的对照中实现从经验描述向理论表达的跃升,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生命力既存在于科学发展范畴特殊与范畴一般的辩证统一中,也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在具体的探索路径上,对比较、全面与发展方法的创新应用,对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有机融合,是王亚南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方法论启示。对于方法的创新应用,以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在比较研究中以时空参照确立特征、在全面研究中深入交互关系发现差异、在发展研究中捕捉历史连续性,有助于实现范畴特殊的提炼、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的区分与结合。对于学科的有机融合,以历史实践经验为基础,政治经济学提供抽象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经济史学提供跨时空的历史参照与规律借鉴,中国经济史提供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现实基础,有助于确保研究的逻辑性与系统性、避免研究陷入本土经验的狭隘或脱离实际。

总之,王亚南从历史回溯到范畴重构的研究,既是当时发展中国经济学、指导认识中国社会与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也为当下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借鉴。立足中国现实提炼范畴、在范畴特殊与范畴一般之间保持理论根系脉络的延伸拓展,是王亚南所指明的理论体系发展所应遵循的路径,在当下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探索中应得到更多的挖掘与重视。

参考文献:

- [1] 布朗等,2007:《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93-114页。
- [2] 蔡鸿源、徐友春,2012:《民国社会党派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第135、162页。
- [3] 恩格斯,2012:《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页。
- [4] 霍奇逊,2012:《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杨虎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扉页。
- [5] 刘守英、熊雪锋,2022:《坚持问题导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
- [6]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6页。
- [7] 邱士杰,2022:《王亚南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互动》,《开放时代》第5期。
- [8] 孙圣民,2023:《经济学理论、实践与本土化——兼谈中国自主的经济学体系构建》,《经济研究》第12期。
- [9] 孙正聿,2024:《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 [10] 王鹏翀、梁捷,2026:《早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范式中唯物史观的影响》,《上海经济研究》第1期。
- [11] 王亚南,1988:《王亚南文集》第四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第95-96页。
- [12] 王亚南,2014:《中国经济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2、18、20、32、36、144、261、386、400-410、429页。
- [13] 王亚南,2017:《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页。
- [14] 王亚南,2025:《王亚南著作全集》第10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70-76、78、80、82-84页。
- [15] 习近平,20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338页。
- [16] 杨继国,2022:《“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辨析——纪念王亚南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国经济问题》第1期。
- [17] 约瑟夫·熊彼特,2017:《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1页。
- [18] 曾景忠,1988:《重新审视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社会科学》第6期。
- [19] 邹进文,2010:《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20] Bisin A. and G. Federico, eds., 2021,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Cambridge: Academic Press, xv–xxxviii.
- [21] Cantoni D. and N. Yuchtman, 2021, “Historical Natural Experiments: Bridging Economics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Cambridge: Academic Press, 213–241.
- [22] Manioudis M. and D. Milonakis, 2021,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and the Economic Past: Setting the Scene for Economic Histor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8(1), 142–163.
- [23] McCloskey D.N., 1976, “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2), 434–461.
- [24] Morck R. and B. Yeung, 2011, “Economics, History, and Causation”,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85(1), 39–63.

From “Historical Retrospect” to “Categorical Reconstruction”: Wang Yanan’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Economics

YANG Huta¹, TANG Yu²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2.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economics is both a mission of the times and an academic challenge. This paper takes Wang Yanan’s economic research as its subject,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s his academic approach to applying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China’s economic reality, focusing on how to grasp reality systematically, how to extract indigenous categories from reality, and how to support these two processes with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Taking the “specificity of categories” as his starting point, Wang Yanan reveale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economy through the negativ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forms of commodities, capital, rent, wages, and so on. He achieved a fundamental shift from mechanically applying existing theories to extracting original categories and discovering inherent laws. The combined use of the comparative, comprehensive, and developmental methods he advocated is inherently consistent with the retroductive analysis of critical realism at a deep methodological level. Furthermore, his emphasis on and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the “trinity” of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historiography, and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established a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ory–history–reality”, which transcend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historical detail studies” and “persistenc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 and historical studies. Wang Yanan’s methodological legacy still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economics.

Key Words: Wang Yanan; specificity of categories;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 critical realism;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责任编辑:张兴祥〕〔英文校对:许梦涵〕